

复旦政治与行政研究丛书 No. 14

政治知识化 与 现代政治的成长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研究

何历宇 著

政治知识化与 现代政治的成长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研究

何历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知识化与现代政治的成长: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研究/何历宇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3

(复旦政治与行政研究丛书)

ISBN 978-7-201-05797-2

I. 政… II. 何… III. 民主—政治制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D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229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1 插页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3,000

定 价:25.00 元

总体策划：林尚立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

王邦佐 孙关宏 邱柏生

竺乾威 林尚立 曹沛霖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07 年重点课题项目

浙江财经学院 2008 年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序

在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下,中西方最明显且最深刻的差异莫过于政治发展中的制度问题。在西方,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发展过程,受科学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影响,比较重视制度的建构,致力于用制度解决社会与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比较重视个人的主观因素,尤其强调依靠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和智慧解决各种政治问题。所谓“千钧一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讲的就是这种情形。对此,我曾经在为研究生授课时作了一个过河的比喻,用来说明中、英这样两个各自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深刻差异。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原发性文化的发展过程,都具有某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但是怎样摸着石头过河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英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每遇到走不通或水深的地方就插上一面旗帜,后来者见此旗帜自然就绕开走,随着插的旗帜越来越多,过河的路自然慢慢就形成了。而中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先行者发现了问题或找到了路,往往并不为后来者作出标识,或者这样的标识也往往停留于个人的精髓思想之类,非有相当悟性和功底难以得其要领。于是,一个一个的过河者都要这样重新摸索,凭借个人超凡才能顺利过河者有之,侥幸绕过各种陷阱得其善终者有之,不幸掉入陷阱半途而废者更有之。这里讲的标识或旗帜实际上就是作为政治文明载体的制度。

当然,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完全没有制度建设,甚至说

英国人的制度就一定比中国人的多,显然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道理很简单,任何文化传统的基本载体就是制度,没有制度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文化上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也是很发达的。不过,我的比喻还是基本成立的。因为中西政治文化对制度的规定和认识存在的差异,使得西方政治文化具有某种“典型性”,而中国政治文化对制度的认识则往往具有某种模糊、抽象和难以显露的特征,它的运作仍然过多凭借个人的心领神会和才智,悟性资质平平者往往难识其中奥妙。换句话说,相对于西方的制度而言,这是一种没有知识化或者很难知识化的制度,很难说清楚或者无法说清楚的制度。其难于言说的特点也使得其自身的积累很难进行,或者长期原地踏步,或者为中国特有的历史周期的轮转毁于一旦,不断地重新开始。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自近代中西文化大规模冲突发生以来,国人一再惨败的历史遭遇以及异域文化的特质,吸引了无数学者对此探究和思考。除了基于救国救民的激进的革命思潮以及持现代西方价值观的自由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之外,一些对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感情的学富五车的学者也在思考着这一问题,其中牟宗三等新儒家大师的思考最为典型。牟先生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构起连接“内圣”与“外王”之间的桥梁,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出发,通过良知坎陷,开发出中国社会急需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文化,建构起现代政治知识体系和发展科学技术,以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维护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随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引进,不少学者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难找到与西方“政治学”对等的东西。有的人认为中国大有“治学”无“政学”,就是说中国政治文化中存在很丰富的治理技术和官场经验,但是关于政权运作的一般经验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系统的探讨。当然,我们仍然不能因为与现代西方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一些东西就说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历史和现实表明,没有一种传统能够具备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所

有要素,传统没有的也不能说现在就不能有。完全否定传统不对,固守传统更危险。毕竟,人类的一切文化和知识都要服务于人的生活及其发展;只要是我们现实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只要是符合人性自身的完善和发展的,都是需要我們认真研究和汲取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价值的确立,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一整套政权制度建设,新中国政治发展的知识资源、制度资源以及基本价值,所有这些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构件都齐备了。但是,后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所遭遇的一系列严重挫折,尤其是个人崇拜的极端发展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表明,问题远比设计者最初想象的复杂;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超大规模国家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个人或者某些精英人物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历史总是有惯性的,民族越大,历史越久,惯性越大。我国过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之所以遭遇那么多的严重挫折,撇开政治精英主观层面的失误不说,也不论当时面临的各種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仅从我们相关的知识储备和传统文化上来说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其中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注意的: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为我们留下系统的政治知识体系,更没有作系统的制度设计。相反,按照他们的想法,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国家”应当是自行消亡的东西,由于“人对物的管理将全面取代人对人的统治”,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事务也将趋于消失。这一点,我们在革命成功后,当时确实是毫不在意的。二是由于政治学学科的地位遭到否定,政治知识的探讨和积累极为缺乏,我们长期在价值、制度与民众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基本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基本制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没有根本摆脱西方制度影响的苏联经验,而民众政治文化实际上长期在传统专制文化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某种混合物的制约中没有得到深刻反思和清理。因此,人民民主

如何落实为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如何培育适应和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从这里我们清醒地反思一下,就不难体味到政治知识化的重要意义,中国政治要健康发展就离不开政治知识的系统积累和发展。

“政治知识化”的说法,就像科学化、理性化、大众化、哲学化等等概念一样,很自然地是人们在讨论各种政治问题时提出的,是对政治现象的一种认识。但是,还没有学者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使用过。我在授课过程中提出这一概念后,也没有对其含义进行过清晰界定,也未公开发表过相关论文。因此,存在着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据我的记忆,最先自觉把这一概念作为学术概念加以使用的刘建军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中国现代政治成长的知识转型问题,他在其论文中全面讨论了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化的特点及其对现代政治转型的影响,提出构建现代政治知识体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底盘”。显然,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在于强调,政治知识化就是政治形态的系统的主观意识表现和建构,至于政治知识化过程的内在机制,不是他这篇论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后来,何历宇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政治知识化的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经过长时间的文献阅读和深入思考,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概念,可以作进一步的学术上的提升,借此揭示西方现代政治发展中影响其过程的某些要素。几经思考,最后他决定把这个概念性的命题当作博士论文来做,定题为“政治知识化与现代政治的成长——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研究”。

在他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们就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逐步清晰起来。实际上,政治知识化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更是一个规范价值的概念。政治知识化,不仅包括借知识“识”政治的一面,更含有将政治本体建构成知识、转化为知识的一面。因此,政治知识化是政治学科的发展与政治科学化的统一,是知识积累与政治制度化的统一,是知识

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统一,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理性化的统一。政治知识化的核心是政治理性化。这样,政治知识化概念,既与制度化、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等一般通用概念有联系,同时它又具有这些概念所没有的独特视角和综合性,通过它,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观中介机制的重要意义。我们常说,只有生长的制度才是成熟的制度,这里“生长”一词的合理含义只能是制度、文化与知识体系发展的有机统一。何历宇博士在其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过程,就政治知识化的文化及其社会基础、政治知识化与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的关系、政治知识化与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关系、政治知识化与公民文化的培育、政治知识化与当代西方政治的转型以及政治知识化本身的限度与两面性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当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一开始其含义和理论价值都不会是很清楚的,要对这么一个含义比较模糊、涉及内容非常复杂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历宇博士的论文只是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他在论文中对民族国家的成长、民主制度的建构、公民文化的培育、基本政治价值的提炼等方面进行了历时性考察,但这些方面的内在关系的共时性考察,还有许多后继性的研究工作要做。

何历宇的这项以博士论文的形式进行研究的成果即将作为学术专著公开出版了,我是指导这篇论文的导师,当然从心底里感到十分高兴。但是,我在这里只是作为这项研究成果如何取得的见证人,至于对它该作如何评价,那就得由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来说了。

是为序。

曹冲霖

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7年10月30日

中文摘要

关键词：政治知识化 现代西方 民主政治 成长

本书试图通过政治知识化这个视角,考察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成长的基本过程,揭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政治知识化过程的紧密联系。所谓政治知识化,指的是现代政治的知识建构性与知识积累性。

第一章是导论。¹本章通过总结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学关于民主政治发展的认识轨迹以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出政治知识化是考察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民主政治是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了主体的知识基础,现代政治发展是不可理解的。本章还考察了政治知识的特点以及政治知识化的主要内容,指出政治知识具有经验性和规范性两重属性。政治知识化是政治学科的发展与政治科学化的统一,是知识积累与政治制度化的统一,是知识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统一,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理性化的统一。政治知识化的核心是政治理性化。

第二章考察了政治知识化何以可能的条件。首先,政治领域成为可认知的对象是政治知识化的前提条件。没有主客体的对立,事物不能成为对象化的存在,任何知识都不可能产生和发展。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从直接的思维机制上说,现代主权观念产生的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为政治对象化提供了条件。人民主权观念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为探讨政权运行的一般

摘 要

规律提供了公共空间,为政治治理积累经验消除了专制权力的根本障碍。从社会条件看,现代主权与治权分离的基础存在于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需要政治上的代理人。代理的风险以及对代理人的监督和控制促进了现代政治的公开性、透明化,为政治知识化提供了认识前提。

其次,理性化是政治知识化的动力机制。现代政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利益制约欲望使得现代政治行为趋于理性化,利益内涵的演变也在不断推动政治知识的发展。在近代西方,由于马基雅维里区别了政治与道德,第一次把政治建立在现实的利益基础上,被看成是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利益原则就是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打量政治生活。利益原则也被看成是人性恶的另一种表述。人性恶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论假设,也是促进西方政治学繁荣的基本理念。

最后,现代政治的社会化为政治知识化提供了坚实的主体基础。传统政治形态政治知识化机制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主体狭窄,仅仅局限于极少数政治精英人物,加之政治知识的传播受到严格限制,政治领域几乎是一个研究的禁区。因此,一旦遇到社会动荡或者改朝换代的情况,政治知识的积累就会中断甚至倒退,现实社会就会陷入简单复制的“克隆政治”的泥淖中。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社会成了知识积累的主体,知识分子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作为国家制度的普选制度和政党制度充分促进了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国家与社会在政治知识化过程中实现了结合。

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本书的主体内容,具体探讨了现代西方政治的成长过程与政治知识化的密切关系。本书把现代政治的要素分成四个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公民文化、民主价值。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的载体和前提;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的主体内容;公民文化是支撑民主制度的精神基础;民主价值是现代政治

的灵魂和核心。与之对应的政治知识化机制也包括四个方面：政治科学化与学科发展、制度建构与知识积累、政治教育与知识传播、哲学批判与价值提炼。学科发展是现代知识积累的重要环节；制度建构是知识积累的基本形式和动力；政治教育把知识转化为民众的文化、心理与常识；价值提炼是知识的升华并且为知识积累在新的水平上展开提供了可能。

第三章考察民族国家的成长与政治科学化和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关系。民族国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载体，民族国家的成长与政治科学化发展密不可分，现代民族国家对政治知识的大量需求最终催生了现代政治学。民族国家的产生体现为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政治科学化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政治科学化是政治学科产生不可或缺的步骤。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是通过权力与知识的广泛结盟实现的，首先是法学家，接着是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民族国家对法律、制度、政策、国民认同的需求，不断促进政治知识的发展。没有现代政治学的发展，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是很难理解的；而没有权力对知识的大量需求，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很难理解的。

第四章考察现代民主制度与政治知识转化和创新的关系。从制度与知识的关系来看，二者是相互转化的。一方面，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其知识基础的发展。现代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向建构制度的知识原理转化的直接产物。这一转化所产生的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原理、分权制衡原理、法治原理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四个基本原理。同时，在制度的创建、运作和完善过程中，知识的创新和阐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民主价值的知识化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政治知识积累与实践经验的结合是制度生成的中介，政治知识的再创造是民主制度巩固的关键。在制度的运作过程中，知识阐释对于制度的磨损、短缺、失灵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对于民主制度的异

化现象,规范与经验的互动是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总之,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载体,知识转化为制度本身是知识积累的主要形式,为制度发展提供知识基础也是知识积累的重要形式。

4 第五章考察现代公民文化与政治教育和政治知识传播的关系。从公民文化与政治知识的关系来看,一方面,政治教育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另一方面政治教育通过把理论性的政治知识转化为指导公民政治行为的常识、文化和心理实现了知识积累。现代公民文化是与市民社会的产生分不开的,基于利益的理性化是现代公民文化的基本特点。这意味着现代公民文化不能自发形成,也不能像古典民主制那样寄托于宗教,它需要政治知识的引导和培育。现代政治学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自觉地把培育现代公民文化作为自己的基本使命。总的来看,引导社会思潮是政治教育的着力点,媒体与法律共同体是政治教育依赖的重要主体力量,学校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基础性工程,公民政治参与是政治教育的根本保障。公民文化的成长同时也是政治知识积累的重要环节,这不仅指它为政治知识积累提供了广泛的主体基础,而且知识沉淀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心理本身也是知识积累的重要形式。

第六章考察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困境与政治哲学的边缘化及其复兴的关系。价值与知识是相互转化的。现代政治的成长离不开价值的引导,关注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的使命。从启蒙思想家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歌唱和向往,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政治意识的呼唤,到新共和主义对公民德性的重塑,到罗尔斯政治哲学对政治正义的关注,再到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思想家对整个现代政治的重构,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以及政治知识积累的过程中,政治哲学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维度。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的内在逻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价值困境。坚持价值中立使政治科学化日益陷入困境,制度崇拜使文官制度由完善走向失范,程序民主的神圣化使精英政治成为民主政

治绕不过的暗礁。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局限的总病根是价值困境,只有真正突破了资本的价值逻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才能走出困境,政治知识化才能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展开。

第七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本书最后指出,由于政治知识内容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政治知识化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促进和巩固了现代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它的片面发展又具有一定的消极后果。因而,只有立足于对政治特点的全面理解,把价值关怀与知识建构结合起来,才可能尽量避免各自片面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当然,由于政治领域强烈的实践性和规范性,政治知识化本身也有其固有限度。

Abstract

Key words: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democracy growth

In the view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namely the constructive-ness and accumulatenes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author wants to explore the basic process of the growth of western modern democracy and reveals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the course of western modern democracy.

In chapter I, after summarizing the study of modern politics in western intelligentsia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this book proposes that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viewpoint in which modern democracy can be explored deeply. Democracy is the people's practice, and so without the people's knowledge about i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litics cannot be understood. Additionally, this chapter analyze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 of practicality and normality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explores the main content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The content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in the scientific process of politics; the conversion between system and knowledge;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nomination of value in the criticism of philosophy.

In chapter II, the conditions that how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is possible have been explored. There are three conditions: the recognition of political fiel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action; the socialization of politics.

Firstly, the precondition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is that political field should be recogniz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Without the separation, any knowledge cannot come into being. In the view of thinking mechanism, recognition of politics is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sovereignty and executive power. With the idea of the people's sovereignty the problem of that who should get the supreme power has been resolved, and a public field in which the exploration of power exertion becomes possible has been provided. With this idea the barrier, which arises from tyranny, of accumulation of governing experience has been cleared. In the view of economic reason, this separation has arisen from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which calls for the political agent of capitalist. The risk of agency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make modern politics more public and more perspective, which help promote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Secondly, the 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action is the momentum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ization.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is built on interests which controlling passions have made political action rationalization. Political knowledge has constantly been develop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ests.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y, Machiavelli is reckoned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politics because he firstly differentiates politics from traditional morality, which means that politics has been constructed on base of interests. The principle of interests have legitimized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made people observe politics in the view of realism. This principle is the other word of the theory of the evil of humanity, which is a crucial hypothesis and an important idea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